

国家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优秀成果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

陈建华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 / 陈建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66-8603-8

I. 中… II. ①陈… III. 文学史—研究—俄罗斯 IV. 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441 号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

ZHONGGUO ESU WENXUE YANJIU SHILUN
陈建华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刘 玮 杨 耘 周显军 王晓婷
责任校对: 刘春莉 何建云 李小君 郑 葱
封面设计: 周 娟 钟 琛
版式设计: 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6.25 字数: 1745 千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366-8603-8
定价: 186.00 元(1~4 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Проект в област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в рамках госпрограммы

истор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тае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Чэнь Цзяньху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 Чонь Ци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Чунцин



National Project under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for Social Science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Edited by Chen Jianhua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谨以此书献给
2006 中国“俄罗斯年”和 2007 俄罗斯“中国年”**

**Книга посвящена
Году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в 2006 году
и Году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в 2007 год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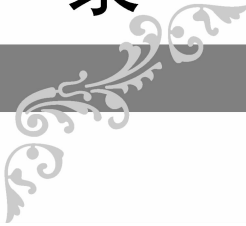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
the “Russian Year” in China in 2006
& the “Chinese Year” in Russia in 2007**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

Истор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тае

卷三

目 录



第五编 中国对俄国古典作家的研究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普希金研究 /3

初识普希金—对普希金认识的调整—新时期以来的普希金研究

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莱蒙托夫研究 /24

早期的莱蒙托夫研究—莱蒙托夫研究的展开与沉寂—莱蒙托夫研究的深入

第二十三章 中国的果戈理研究 /39

进入中国批评视野的果戈理—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批评中的误读—果戈理研究的模式化—走近真实的果戈理

第二十四章 中国的丘特切夫研究 /59

丘诗译介的序幕—在“秘密”中进行的译介—研究的逐步展开—研究的系统与深入

第二十五章 中国的冈察洛夫研究 /75

冈察洛夫译介与研究的初步展开—冈察洛夫研究的新见与识见

第二十六章 中国的涅克拉索夫研究 /90

20 世纪上半期的涅克拉索夫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研究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 /103

从“知之者少”到“被译得最多”—批评的魅力与悲哀—重受青睐的“北国巨人”

第二十八章 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122

初入中土“为人生”—社会学语境中的“两面人”—走进新时代的“先知”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 /148

初识奥氏—建国后 17 年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

第三十章 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 /162

初入中国的托翁—评价的分歧：崇拜与贬斥—新时期以来的托尔斯泰研究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契诃夫研究 /185

20 世纪上半期的契诃夫研究—50 ~ 70 年代的契诃夫研究—80 年代以来的契诃夫研究

第六编 中国对俄苏现当代作家的研究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高尔基研究 /217

初识高尔基—20 世纪 30 ~ 40 年代的高尔基研究—高尔基在建国后 17 年和“文革”中的命运—新时期以来的高尔基研究

第三十三章 中国的蒲宁研究 /242

初入中国:边缘地带的蒲宁—骤然升温:获诺奖后的蒲宁—重新聚焦:新时期以来的蒲宁研究

第三十四章 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研究 /256

20 世纪上半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研究—解放初期到“文革”时期的研究—新时期以来研究的展开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叶赛宁研究 /273

20 世纪上半期的叶赛宁研究—20 世纪 50 ~ 80 年代的叶赛宁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叶赛宁研究

第三十六章 中国的布尔加科夫研究 /292

破译结构的迷宫—对精神伦理意蕴的挖掘—主题和形象研究—历史文化底蕴的诠释

第三十七章 中国的茨维塔耶娃研究 /310

20 世纪 80 ~ 90 年代的茨维塔耶娃研究—新世纪以来的研究

第三十八章 中国的阿赫玛托娃研究 /324

初识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研究的新气象

第三十九章 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 /333

帕斯捷尔纳克研究的基本面貌—《日瓦戈医生》研究

第四十章 中国的纳博科夫研究 /349

《洛丽塔》研究—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的演变传承研究—作品的后现代性问题研究—跨文化、跨民族性问题研究

第四十一章 中国的肖洛霍夫研究 /368

20 世纪 30~70 年代后期的肖洛霍夫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的研究

第四十二章 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 /382

索尔仁尼琴作品研究—作家研究:几种评说

第四十三章 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401

艾特玛托夫研究的基本面貌—《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
台》研究

第四十四章 中国的拉斯普京研究 /416

初期的拉斯普京作品译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研究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普希金研究

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 另有中译名伯是斤、普式庚、朴思砮、蒲轩根、普希庚、普稀金等。在中俄文化交往史上, 中国的普希金研究开风气之先。在俄国作家中, 普希金的名字最早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在俄国文学名著中, 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最早被译成中文。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 普希金研究从浅显的介绍到深入的探讨, 从声调单一到众声喧哗, 中国的普希金学初步形成。

一、初识普希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介绍普希金的文字。最初的几段文字都为译文。1897 年 6 月《时务报》第 31 册上刊载的日人撰写《论俄人之性质》一文, 提及诗人“伯是斤”(即普希金)和他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埃务剧尼”(即奥涅金)。1900 年, 上海广学会发行的《俄国政俗通考》(译自英文)一书中再次出现普希金的名字, 称他为俄国“著名之诗家”。1903 年出版的《俄罗斯史》(译自日文)称普希金是“文学界中首屈一指”的 9 位名家之一^①。

1903 年, 上海大宣书局发行了普希金(即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 由戢翼翬据日文译出^②, 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部俄国文学名著, 译文采用文言章回体形式。虽然译者在书名、人名、人称、篇幅、情节、体式等方面对原著有不少改写和误译, 但是戢氏的译文在主要情节上与原作是基本吻合的, 而且译笔晓畅优美, 无怪乎译作一出即备受赞扬。黄和南在译本绪言中写道: 译作“能以吾国之文语, 曲写他国语言中男女相恋之口吻, 其精神靡不毕肖。其

① 有关材料可具体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一章。

② 有关该译本发现的经过和相关的史料, 可参见戈宝权《中外文学姻缘》, 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五编 中国对俄国古典作家的研究

文简,其叙事详。其中之组织,纤徐曲折,盘旋空际,首尾相应,殆若常山之蛇”^①。顾燮光也曾在《译书经眼录》中称赞该书“情致缠绵,文章亦隽雅可读”。黄和南为《俄国情史》写的700余字的绪言,是中国文坛对普希金作品的第一篇评价文字。

中国最早对普希金作比较全面介绍的文章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8)。这篇文章中有关普希金的文字约1000多字,作者在撰文时有所取舍地引述了日本八杉贞利的《诗宗普希金》和丹麦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两书中的某些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作者首先高度评价了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贡献:普希金“初建罗曼宗(即浪漫派)于文界,名以大扬。”“俄自普式庚,文界始独立”。鲁迅又在比较中凸现了普希金创作的特色。如在与拜伦比较时指出,普希金早期创作受拜伦影响,“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即《高加索俘虏》),之与《哈洛尔特游草》(即《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相类”,《及泼希》(即《茨冈》)中也可见到拜伦影响的痕迹。但是,这两首诗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也就是说,普希金长诗中的主人公虽然同样被世人放逐,但又离不开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特征,表现出“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的性格特点。诗人对主人公的弱点“不与以同情”,“悉指摘不为讳饰”,“故社会之伪善,既灼然现于人前”。在《茨冈》一诗中,诗人赞扬的是茨冈人的“朴野纯全”。可见,普希金所爱已“渐去裴伦式勇士而向祖国纯朴之民”。此后普希金的创作“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鲁迅还将普希金的创作与莱蒙托夫和密茨凯维奇等人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章特别推崇“巨制”《叶甫盖尼·奥涅金》,称其“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主人公更加真实,“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同时,鲁迅也指出了普希金后期一度对沙皇政权存有幻想,“立言益务平和”,并在《俄国之谗谤者》(即《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及诺之一周年》(即《波罗金诺纪念日》)等诗篇中“美其国之武功”的沙文主义倾向。鲁迅早期大力提倡文学上的“摩罗诗派”,赞美积极浪漫主义的热烈的抗争精神。正因为这样,鲁迅在论及俄国文学时,选择了俄国文学中“摩罗诗派”最杰出的

① 关于此中文译本与原著的对比研究,可参见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一书(学林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新版)。对黄和南文的评价,可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一章。

代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加以重点介绍,热切地希望黑暗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的精神战士。

二、对普希金认识的调整

在初识普希金之后,普希金逐渐成为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不过,中国学界对他的认识的深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期间有过几次调整,在这种调整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 小说家普希金

尽管在中国最初介绍普希金的文章中已明确了他的诗人身份,但是在普希金的名字进入中国后的将近30年间,人们只是见其小说而未见其诗歌。

辛亥革命前后,除戢翼翬首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外,中国译者还译出了普希金的另外3篇小说:《俄帝彼得》(即《彼得大帝的黑奴》),冷(即陈景寒)译;《神枪手》(即《射击》),毋我、冷译;《棺材匠》,毋我译。这3篇作品分别刊载在1909年至1913年的《小说时报》上。“五四”高潮时期至20年代中期,沈颖、胡愈之和郑振铎等译者又先后译出了普希金的一系列小说,如《驿站监察史》(即《驿站长》)、《雪媒》(即《暴风雪》)和《承办丧事的人》(即《棺材匠》)等;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安寿颐据俄文较为忠实地译出的小说《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赵诚之据俄文译出的《普希金小说集》,内收《情盗》(即《杜勃罗夫斯基》)和《铲形的王后纸牌》(即《黑桃皇后》)等9篇中短篇小说。

由此可见,中国文坛当时感兴趣的是普希金的小说,不仅将他的主要小说基本译出,而且个别小说有了多种译本,有的还直接译自俄文。那么,以诗著称的普希金为何却首先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中国文坛所接受呢?究其原因,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时的社会对小说的重视超过诗歌。晚清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人曾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他们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小说创作和翻译。黄和南为戢翼翬所译《俄国情史》写的绪言中谈到:该译作“非历史,非传记,而为小说”。“夫小说有责任焉。吾国之小说,皆以所谓忠君孝子贞女烈妇等为国民镜,遂养成一奴隶之天下。然则吾国风俗之恶,当以小说家为罪首。是则新译小说者,不可不以风俗改良为责任也。”可见,译者与评价者在译介这部作品时都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戢氏译本中显示出来的这些特点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俄

第五编 中国对俄国古典作家的研究

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种风气的影响一直延伸至民国初年乃至“五四”时期。

二是当时的文坛对富有人道色彩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超过浪漫主义作品。鲁迅在 20 年代回忆他当年对拜伦和普希金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坟·题记》）鲁迅的这种喜好上的变化其实正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文坛趣味的变化。如耿济之在为安寿颐所译小说《甲必丹之女》所写的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先以友人的口吻强调介绍外国文学“当以写实派之富有人道色彩者为先”，而后耿氏虽指出在写实派和浪漫派之间“并不能截然划一鸿沟”，但肯定的还是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将蒲格撤夫（即普加乔夫）作战时代之风俗人情描写无遗，可于其中见出极端之写实主义。”瞿秋白当时也认为，普希金的成就与诗歌和小说均与“写实有的生活”分不开，他的作品“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①；他的《驿站长》的魅力在于“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②。

三是当时的文坛对普希金诗歌的魅力缺乏足够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不少人把普希金仅仅看做是一个“社会的诗人”，对他的诗歌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价值了解不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作进一步分析。同时，译出形神兼备的诗歌具有相当的难度，当时的中国翻译界在总体上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非局限于普希金这位诗人，其他外国诗人作品的翻译上也具有相似的现象。

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初期稍有变化。《文学周报》1927 年第 4 卷第 18 期发表了普希金的诗作《致诗友》，译为孙衣我。1933 年，哈尔滨精益书局出版的《零露集》一书中收入普希金《致大海》和《一朵小花》等 9 首诗歌，译为温佩筠。但是，“诗人普希金”真正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一直要到 30 年代中后期，即中国文坛首次大规模纪念这位俄罗斯诗人之时。

（二）革命诗人普希金

如果说译界最初提供给中国读者的是小说家普希金的形象的话，那么评论界对普希金的诗人身份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但是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① 瞿秋白：《俄罗斯文学史》（下篇），创造社出版部 1927 年版。

② 瞿秋白：《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6 页。

里,他们为中国读者描绘得更多的是革命诗人普希金形象。

普希金的这种形象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介绍中已初露端倪。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是当时较早谈到普希金的文章。文章介绍说,俄人称普希金为“俄国诗界无冠之帝王”,他有一诗,“题曰‘自由歌’(Ode to liberty)”。其诗一片天真,热情横溢,质诸俄国皇帝,劝彼辈稽首于法律之前,倚任自由为皇位之守卫。”显然,出于题旨的需要,文章并没有全面评价普希金,而仅提及《自由颂》一篇,强调的是诗歌的思想内涵。其他几位前期诗人,作者列举的也都是些为自由而呐喊的诗篇,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雷列耶夫的《沉思》和奥加廖夫的《自由》等。文章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对普希金的基本认识,其褒贬的尺度与他们的政治观和文学观是一致的。

当然,“五四”时期一些研究者在强调普希金是“社会的诗人”的同时,也比较注意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如田汉在《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中认为:普希金的伟大“首在表现俄国之社会倾向与要求,次在造出能活现国民思想感情之用语”。不过,他对后者的评述较为深入:普希金“将俄国民间活语信手拈来,任描写何种纤细之印象、幽微之波动,意无不达,始其创作后世奉为国语之宝藏、文章之圭臬焉。又与俄国民生活之真相、自过去现在之状态、迄言语风俗习惯之末,靡不细心研究。故其作品于俄国之自然、生活、国语、国民性,如镜中之映物,无微不显。读《罗丝兰与绿德密拿》(即《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士官之女》(即《上尉的女儿》)、《优格尼阿内金》(即《叶甫盖尼·奥涅金》)诸作,可以知矣”^①。瞿秋白当时关于普希金的一些评述在衡量尺度上也与田汉相似。

这一时期介绍普希金生平与创作的文章还有西曼的《俄国诗豪朴思轻传》^②、K. H. 的《普希金评传》^③、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钱杏邨的《俄罗斯文学漫评》和侍桁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初期的二诗人》^④等。1929年,上海生活书店还出版了茅盾等人翻译的《普式庚研究》。西曼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的生活经历以及不同时期的创作情况,史料翔实,行文流畅,虽然许多问题尚未

① 田汉的上述文字中可以见到日本学者升曙梦的影响,参见1921年9月《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升曙梦的《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陈望道译)。该文称赞普希金“能将俄国民间底活语信手拈来,无论描摹怎样纤细的印象,怎样幽微的波动,都很巧妙。所以他底创作,就是现在也还是国语底宝库”。

② 《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

③ 《学灯》,1923年2月21日—3月1日。

④ 《华北时报副刊》,1929年8月13—23日,北平。

第五编 中国对俄国古典作家的研究

展开。钱杏邨认为普希金的《情盗》(即《杜勃洛夫斯基》)“表现了当时俄罗斯帝国的两种对抗的力:大地主的穷凶极恶,与农奴们不屈服的抗斗。他写出来了当时俄罗斯人命运的全部,用缩写的方法,说出最后的胜利归与有产者,无产者只有悲愤和失望”^①。

中国的普希金作品译介经过 1925—1936 年将近 12 年的相对沉寂后,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至 40 年代进入了新的活跃期。1935 年和 1936 年的《译文》杂志就译出普希金抒情诗和长诗 20 多首,以及小说和剧本多种。这两年的《译文》中还刊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式庚论》(丽尼译)、涅克拉索夫的《普式庚略传》(孙用译)、涅克拉索夫的《欧根·奥涅庚导言》(孙用译)、阿胥金的《普式庚怎样写作》(陈冥译)、雪纪衣夫斯基的《高尔基论普式庚》、史洛尼姆斯基的《论普式庚的童话》(克夫译)、升曙梦的《普式庚与拜伦主义》(雨田译)等重要文章。

30—40 年代,中国举办的 3 次纪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普希金的影响。3 次活动分别是 1937 年纪念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②、1947 年纪念普希金逝世 110 周年^③和 1949 年纪念普希金诞生 150 周年。当时,与纪念活动相应,一些协会、刊物和出版社纷纷推出纪念专刊或纪念集,如《普式庚特辑》、《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普式庚逝世百周年会集》和《普希金百年祭纪念册》等。此外,《普式庚创作集》、《普希金文集》、《普式庚研究》、《普式庚论》、《普式庚论集》、《普希金评传》,以及刊物上的各种著译文字也大量出现,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④在内的普希金的许多重要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了中国。这是普希金作品在中国的一次大普及。

随着中国进入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阶段,以及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迅速

① 《俄罗斯文学漫评》,载《小说月报》,第 19 卷第 1 号(1928)。

② 1937 年中国文化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的活动,在上海竖起了普希金铜像,放映了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电影,译介了普希金的大量作品,被称为“普希金年”。就研究译文而言,有吉尔波丁《普式庚纪念与文艺的气质》(铁弦译)、犹劲的《普式庚的受伤与死亡》(劳曼译)、日本改造社编《普式庚年谱》(雨田译)等,也有国人(蔚明)就中国译者的翻译(赵诚之、立波、孟十还译《杜勃洛夫斯基》的不同译本)谈《关于普式庚的翻译》的文章。

③ 1947 年,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等团体联合举行了纪念普希金逝世 110 周年的活动,集资在上海重建了普希金铜像(原像在“二战”时期被日寇毁坏),出版了《普希金画传》和《普希金文集》等书籍,出版了普希金作品的俄汉对照本等。

④ 这些版本包括 1937 年孟十还译出片断,1942 年甦夫据世界语译出的《奥尼金》,吕荧 1944 年译自俄语的《欧根·奥涅金》。

发展,文坛对普希金的评价开始出现逐步拔高的趋势,“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形象开始凸现出来。

在译介中可以见到这样的倾向,如抒情诗中被反复译出的是《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致恰达耶夫》、《纪念碑》、《阿里昂》、《自由颂》和《致大海》等几首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诗篇。在文章和演说等文字中更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①,以1947年为例,茅盾认为:“诗人的一生就是一首革命的史诗^②。”郭沫若称普希金有几点最值得中国读者学习:“第一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二是他的为革命服务的志趣;第三是在两种生活原则之下,他发挥尽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气概^③。”当然,在郭沫若的演说中,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并非没有对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分析,但其基调是被明显拔高了。胡风对普希金的评价基本上也属“革命诗人”的框架,但语调有所降低。他认为,普希金是“一个反抗旧的制度而歌颂自由的诗人,一个被沙皇俄国虐待、放逐、以致阴谋杀害了的诗人”;是“民主革命运动底诗人,旗手”^④。这样的观点似乎在当时更为大多数人所接受^⑤。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与大环境有关,这里包括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环境。胡风在上文中这样解释中国左翼文坛只接受“革命诗人”普希金的原

① 如容舒认为正是因为普希金“抨击朝廷的虚伪、贪鄙、腐败和紊乱”,引起了沙皇的仇恨,沙皇才假借丹特士之手杀害了普希金(《沙皇是怎样杀死普希金的》,《世界知识》,第5卷第10期,1937年2月),黄源认为普希金是“爱自由”的,他“不屈服于沙皇朝廷而终为沙皇所杀”(《普希金的一生》,《月报》,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15日),施谊以诗歌的形式讴歌了普希金向往自由、追求光明、背叛贵族、最后被阴谋杀害却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不朽生命(《一百年了,阴谋的决斗——为普希金百年祭作歌》,见《光明》第2卷第5号,1937年2月10日),蒲风认为普希金的诗作“对十二月党人作了赞颂,对自由作了颂词,对专制政治投下了讽刺,尤其是对检查官投下了冷嘲”(《普希金在歌唱》,载《普希金诗钞》,广州诗歌社,1938年)。

② 取自1947年2月茅盾为苏联普希金博物馆题字的首句。

③ 郭沫若:《向普希金看齐》(1947年在上海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④ 胡风:《A. S. 普希金与中国》,见《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

⑤ 有些论文仍就某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如徐中玉的《普希金的生平和艺术》提出了普希金的思想矛盾、普希金与拜伦、普希金与民间传说、关于奥涅金的解读等重要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3号,1937年);依然的《苏联为什么纪念普希金》探讨了普希金“用俄国的题材,俄国的民族意识,俄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问题(《苏俄评论》,第11卷第2期,1937年2月);白木在《读欧根·奥尼金走笔》就奥涅金性格形成的国际与国内的环境做了认真分析(《苏俄评论》,第11卷第2期,1937年2月);此外,戈宝权的《普希金逝世百年祭》(苏联通讯)、芜萌的《普希金的作品在中国》、苏芹孙的《普希金百年纪念》、冰菱(即路翎)的《〈欧根·奥尼金〉与〈当代英雄〉》(《文学》第8卷第1号,1937年;《读书与出版》,第2年第2期,1947年;《新中华》,1937年4月;《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2月)等文章也值得关注。